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周 斌

内容提要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关键词 亚细亚民族会议 大亚细亚主义 反对运动

亚细亚主义,又称亚洲主义,是指到战败为止的近代日本围绕着对“东洋”和“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想和运动的总称。它在日本的近代思想史与中日关系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众多中外学者致力研究的课题。其成果之丰硕,难以车载斗量。但是学者们大多关心亚细亚主义在近代日本的形成、发展状况,而对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态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 1926 年 7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曾业英、步平研究员,张静助理研究员和本室同仁指正;又蒙闻黎明研究员和日本广岛大学水羽信男教授提供有关日文资料,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月和 1927 年 11 月在日本长崎、中国上海先后召开的两次亚细亚民族会议为例，尽管美国学者顾德曼开拓性地论述了第一次会议的经过和意义，日本学者水野直树阐述了日本、朝鲜与中国报刊关于两次会议的评论等^①，但对中国代表发起、参与会议的动机和表现，以及国内各界的反对运动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因此难以全面、系统地梳理整个亚细亚民族会议的历史面貌并做出相关评价。水野直树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点，准备撰稿予以弥补，但时至今日，或许是资料所限，仍未见其成果问世。笔者不揣浅陋，试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和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共同发起，直接起因则是 1925 年的五卅运动。

众所周知，五卅运动缘自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继而英国巡捕枪击为此抗议游行的学生群众，因此日本和英国起初被并列为中国人民“反帝”的重点对象。不过随着日本表态愿意和平解决纱厂罢工事件，而英国不仅拒绝承担五卅惨案的责任，反变本加厉又酿成“汉口惨案”和“沙基惨案”，中国群众的反英情绪迅速高涨，逐渐将运动的对象集中于英帝国主义。人们或抵制英货、举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或发表宣言和通电，表达自己对沪案交涉的意见等。一些人如前众议院议员黄攻素、李肇甫等则青睐于类似

^① Grant K. Goodman:《1926 年长崎全アジア會議》,FUKUOKA UNESCO(福岡エヌスコ協会)第 8 号,1973 年;水野直樹:《1920 年代日本·朝鮮·中國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アジア民族會議をめぐる三国の論調》,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綠蔭書房(東京),1996 年版,第 509—548 页。

“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认为中国要发展，“非先打破英人在华势力不可”，应该联合一切亚洲民族以抵抗英国等西方国家。⁽¹⁾ 1925年8月3日，黄、李联系京兆尹公署总务科长马鹤天、华北大学教授王文俊、天津益智通信社社长涂培源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其章程规定：“本会以反抗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之国家，期达亚洲民族平等自由为宗旨”，“设总会于北京，设分会于各省及亚洲各国”。该团体吸纳了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士，如印度狮子·满恩、高丽金弘善、柳长生、郑焕善，日本德光衣城、山瀬悟一（报知新闻记者）、佐佐木健儿等。日本成员还特别声明：“日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本人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与本会宗旨并无不合。”⁽²⁾ 可见亚细亚民族大同盟成立之初，是以反对英、美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实现亚洲民族平等自由为旗帜的，并团结了一部分亚洲各国的反帝人士。

- (1) 《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缘起》，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上海盛华印书馆1926年11月印行，第4页。按：黄、李二人于1913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籍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员，1924年北京政变后，作为反贿选议员参加了国会非常会议，直至1925年5月初该会解散（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年第13期，第183、191页；周开庆：《李肇甫传略》，《革命人物志》第10集，第149页；《非常国会议员亦提议组织临时政府》、《国会非常会议昨开紧急大会》，《晨报》1925年3月4日、4月23日）。另据日本情报称，黄攻素曾是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的发起者（在支那臨时代理公使堀義貴：《長崎二開催セラル全亞細亞民族會議二開スル件》，《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ゾー復制，1-0867，第271页），但中文资料缺乏明确记载，仅提到反帝大联盟由胡鄂公、王文璞等参众两院议员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代表联合发起（《五十余团体合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晨报》1924年7月14日），鉴于黄攻素和胡鄂公、王文璞等议员曾联名电贺中俄恢复邦交是反帝国主义的胜利（《议员电贺苏俄政府》，《晨报》1924年6月18日），可推测黄是反帝大联盟的成员之一。
- (2) 《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北京通信》，《酝酿中之亚细亚会议》，《申报》1925年8月6、7、22日。

与此同时，中国高涨的反英运动引起了大洋彼岸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的注意，该会派遣专务理事兼政友会众议员今里准太郎赴华宣传，联络亚细亚民族提携事宜。^① 今里氏来华后，正值亚细亚民族大同盟成立，便由大同盟会员山瀬悟一引荐，与黄攻素等人协商合作意向。今里氏称，中日为亚洲的两大国，应对亚细亚问题谋一致妥协，互相扶助，有必要发起全亚细亚会议以讨论解决亚洲各问题；中方应该相信日方的诚意，“全亚细亚协会为一种民族的结合，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进而使亚洲民族大团结”；他本人还在去年国会临时会上建议修正对华不平等条约，“群以予为胆大妄为”。黄攻素等人认为，召开全亚细亚会议为“双方国民外交接近之机会，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双方决定由全亚细亚协会、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的名义，通告亚洲各国派代表于明年4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亚细亚民族会议。^② 后因中国北方战事频起，印度等国代表担心在沪开会将遭到英国的干涉，以及与会的大学教授希望会期延至暑假，于是会议改在日本长崎举行。^③

1926年2月11日，全亚细亚协会和亚细亚民族大同盟联名发布榜文，宣称：全人类的共荣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理想，但其实现首先须确保近邻的相扶、相进和善邻的共存共荣，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谋求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即推动亚细亚文化

^① 《全亞細亞協會理事會》(1925年7月25日)、警視總監太田政弘：《全亞細亞協會行動ニ關スル件》(1925年9月1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137、140页。

^② 《酝酿中之亚细亚会议》、《亚细亚会议明年4月在沪开议》，1925年8月22、26日《申报》；《附录》，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80页。

^③ 《筹备中之亚细亚民族会议》，1926年1月31日《申报》；警視總監太田政弘：《全亞細亞協會行動ニ關スル件》(1926年1月27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147—148页。

的复兴,协力开发亚细亚丰富的资源,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经济融合,“本着人种平等的大义为实现世界的和平、全人类共存共荣的理想做出贡献”。文后附有会议的筹备细则,规定中日双方代表分别由两团体推选,其他代表由各亚洲民族自由推荐。^① 7月8日,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由黄攻素、王文俊(后由北京法制大学教授石磊代替)、林可彝(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教授)^②、蔡障川(中华新民通信社社长)、王世鼎(前众议院议员、国务院参议)等5人代表该团体出席亚细亚民族会议,并准备了4项提案:扶助全亚细亚被压迫民族独立案;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持全亚细亚永久和平案;全亚细亚侨民相互平等待遇案;希望日本自动撤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案等。林可彝还就会议的缘起向新闻界宣告:“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系纯为援助亚细亚被压迫民族而组织,日

^① 《全亞細亞民族會議の榜》(1926年2月11日),《アシア》(全亞細亞協會會報)4月号,載《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155页。

^② 林可彝,福建罗源县人,1923至1924年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经彭述之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1月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林可彝烈士传略》,政协福建省罗源县委员会编《罗源文史资料》第2辑“林可彝烈士专辑”,第1—31页)。不过,林加入中共的具体时间尚不确定。据日本情报称,林是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中方代表中最有左倾思想者,是中共党员(在支那臨時代理公使堀義貴:《長崎ニ開催セラルル全亞細亞民族會議ニ關スル件》,《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271页)。但李大钊批评会议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黄攻素、林可彝等一流反动分子,以“欺骗亚东的弱小民族”(《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6页);郑超麟也回忆道:在苏联学习期间,林不是中共党员,只是青年团员(郑超麟著《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197页);而林本人于1927年初致函《向导》周报,询问能否“肯为非党员的我”,刊登《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心理》一文(《读者之声》,《向导》周报第190期,1927年3月6日)。即使考虑到李、林的话可能含有掩护党员身份的动机,但结合《向导》周报对会议的严厉批评态度,还不能断定林可彝与会时已是中共党员,林可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而非组织派遣。

本虽非被压迫民族，而其民众无不遭受政府及资本家之压迫者，故可以联络”；“亚细亚协会本为日本政府背景，现在环境变迁，彼此均有觉悟，故亦可以联络”。^①由此可见，该团体对亚细亚民族会议相当重视，不仅积极参与会议的发起、组织工作，试图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推动全亚洲的独立、平等与和平，而且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因为会议有日人参与而抱有偏见，理解和支持他们的行动。

应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的邀请，上海亚洲民族协会总干事蔡晓白、亚细亚和平研究会方懋林（上海远东大学教授）、亚洲文化共进会主任刘华瑞（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亚细亚问题讨论会林耕馀（上海南方大学附属中学学监）、方孝宽（上海南方大学事务长）等5人被各自团体选为出席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代表。^②虞洽卿、王一亭、李平书、邬志豪、章太炎、唐绍仪、梁启超等人也列名赞助该会。^③对此，会议的组织者们却难以高兴起来，因为传入他们耳际的更多的是批评、反对之声。

7月2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率先发难，致函虞洽卿，反对其支持亚细亚民族会议，理由是：如果日本“对全亚民族大会果具诚意，自当先行放弃其对于各弱小国家之侵略政策，以谋互相提携，而此次大会对于各国政治、商务、财政、文化等问题，始有完善之探究。

^① 《亚细亚大会之华提案》、《出席亚细亚会议代表招待京报界》，《申报》1926年7月10、12日；代表的身份见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頭末》，第13—14页，载《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錄，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ゾー復制，I-0868，第267页。

^② 《全亚民族会议之详情》，《申报》1926年8月9日；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頭末》，第13—14页。

^③ 警視总监太田政弘：《全亞細亞協會ノ行動》（1926年7月28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293页；《亚细亚民族大会之沪讯》，《申报》1926年7月15日。

现于未开会前，既未一度表示其与亚洲各弱小民族合作之诚意，则在大会既开之后，其用心实更难揣测矣。抑更有进者，日人历年来深知我民众对其野蛮行为侵略政策之反对，安知其不将藉此以缓和我民族反抗之气焰耶。倘日本苟别具心肠，则亚细亚民族大会开会之日，即日本帝国主义的门罗主义实行之时”。^① 这番话上海报界竞相报道，对于即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而言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蔡晓白忙出面辩解道：“此次长崎之大会系发生于去年五卅之影响，其内部组织完全由私人筹备。该会极无政治意味，亦非日本政府之宣传机关。现在一般日人深知中日亲善之必要，故有是会之发起。”并说：“外传此会乃日人之口头亲善，乃系共产份子造作斯说，以淆乱听闻也。”^② 但蔡的话并没有消除众人的疑问，上海学联反驳道：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系政学会的众议员，“以政学会之议员而出席讨论政治经济财政之会议，真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之政治势力操纵该会，而决定亚洲各弱小民族利于受彼日帝国主义之牵制吞并也明矣”，不能说该会无政治意味。^③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致函蔡晓白指出，日本果因五卅一案而觉悟，就应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祛除亲善的根本障碍，进而求亚细亚各民族的共存共荣，否则“徒以亲善之空名，作欺骗愚弄之工具”；而据日本消息称，会议发起者有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出席代表有政友会的今里准太郎，宪政会的田中善立诸氏，不是代表军阀官僚就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亦即为日本施行侵略政策的急先锋。会议“经此数人发起，其内幕若何，已不问而知”。^④ 中

^① 《学联会致虞洽卿函》、《申报》、《时事新报》1926年7月21日；《学联会与虞洽卿论中日亲善》，《民国日报》1926年7月21日。

^② 《亚洲民族大会之真相》，《申报》1926年7月22日。

^③ 《亚细亚民族会之反响》，《民国日报》1927年7月27日。

^④ 《蔡晓白谈亚洲民族大会之反响》，《申报》1926年7月24日。

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则批评蔡的辩白为“中国之日本走狗的论据”，“不值一笑”，因为挂亲善面具行侵略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惯技，决不是什么“共产份子造作斯说，以淆乱听闻也”；并指出，本次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精神为“大亚细亚主义”，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具，首先就是为中国而唱的，因为“中国是亚细亚版图最广大产最富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首先当然是中国”。^①

与蔡晓白的处境相似，前文所述林可彝就会议缘起的发言也遭到了《时事新报》的严厉批评。该报首先指出，林可彝等人所联络的亚细亚协会并非日本被压迫的民众，其活跃分子如后藤新平、田中义一等人为日本的政治家或政党领袖，也没有因环境变迁而觉悟，林的话不过是“怪诞自欺”而已；接着斥责林可彝等人挟代表名义赴长崎开会，不过是“鸡豚吾全国人民之公意，而以之献丑于日本”，其“所代表者究为何族，不特吾人无所知，即就询之林君辈，或亦瞠目不能置一语”。^② 坚决反对林等人以中华民族的代表身份出席会议。

综上而言，中方代表与反对者对于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理解有着天壤之别。一方认为会议的召开有助于亚细亚各民族的平等自由，日本全亚细亚协会非日政府的宣传机关，对中日亲善的必要性有所觉悟，可以与他们联合。另一方认为日本缺乏开会的诚意，没有在会前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只是以亲善的空名欺骗亚洲各民族；而且会议的发起者和出席者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今里准太郎等人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有着较强的“政治意味”，欲操纵会议推行侵略政策；因

^① 超麟：《亚细亚民族大会》，《向导》周报第165期，1926年7月28日。

^② 蔡文弦：《可憎之全亚细亚民族会议》，《时事新报》1926年7月30日。

此会议所谓“谋求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不过是日本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侵略亚洲弱小国家、侵略中国的面具，中国不应该派代表出席该会。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该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仍按期赴会，在他们看来，真理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还须从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的由来说起。

日本全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924年7月10日，成员包括贵众两院议员、新闻记者、实业家、学者、宗教家等人^①，其章程规定“本会企图全亚细亚之发达，而以贡献于世界之和平与全人类之福祉为目的”^②，看似“无政治意味”，实际上却有着较强的政治目的。该会发起人政友会总务兼众议院议员岩崎勳曾说：“吾人趁美国制定人种差别的移民法的机会成立大亚细亚协会，以促进亚细亚民族的觉醒，将未来人种的祸乱防遏于未然，以期贡献全人类之安宁。”^③正是出于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排日移民法的不满，一部分日本朝野人士认为未来日美必有一战，主张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的威胁，于是组织全亚细亚协会负责其事。单从理论上说，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等国的威胁无可厚非，因为亚洲国家多受英美强权的压迫，有团结互助的必要性，问题是它能否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能否真正“促进亚细亚民族的觉醒”，“贡献全人类之安宁”。可惜的是，全亚细亚协会并不能担此重任。

虽然说，协会内部不乏提倡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有识之士，如田中守平（神户大灵道主干）曾多次请益于孙中山，十分敬重孙的

^① 《大亞細亞協會第一回总会》、《大亞細亞協會初顔合せ》，《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7月8、11日。

^② 《酝酿中之亚细亚会议》，《申报》1925年8月26日。

^③ 《大亞細亞協會初顔合せ》，《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7月11日。

革命精神和人格^①，但是大部分成员是以本国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而将其他亚洲国家视为日本抵制西方国家、称霸亚洲的工具。其中不用说列名顾问的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后藤新平等“大陆政策”的热心者，就负责协会实际工作的理事会而言，理事小寺谦吉（众议院议员）、上杉慎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当时扩张式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著名代表。^② 理事长岩崎勲据报界透露也主张亚洲以日本为中心来对抗西方国家。^③ 专务理事今里准太郎虽对黄攻素等人说过协会“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其本人也的确在国会临时会上提议过修正对华不平等条约^④，但还不能证明他就是诚心支持亚洲各民族独立平等的志士，其话语难保不含有拉拢中国代表的动机。即便他有心同情中国，且在岩崎勲牵涉松岛游廓事件入狱后，负责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筹备工作，但要让会议“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是不可能的。其一，多数成员以本国利益至上，不会诚意谋求中日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帮助中国取消两国间不平等条约；其二，众多成员分属宪政会、政友会、政友本党等党派，难免不卷入党争之列，身为在野党政友会众议员的今里氏在筹备会议时就受到了执政党宪政会的掣肘（后详述）。因此，协会及其发起的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主要目标还是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

① 林耕馀：《亚洲民族大会之经过》，亚细亚问题研究会 1926 年 12 月发行，第 11 页。

② 《全亞細亞協會設立之宗旨》，《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 181—182 页。

③ 转引自水野直樹：《1920 年代日本·朝鲜·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アジア民族會議をめぐる三国の論調》，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第 510 页。

④ 《今里準太郎提出外交方針ニ関スル質質問主意書》（1924 年 7 月 7 日），《帝国議会關係雜纂／質問答弁》第七卷，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ゾター復制，Reel No. 1—0434，第 341—343 页。

的亚洲盟主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日方发起会议虽目的不纯，但打出“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的旗帜，这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来说是具有诱惑和吸引力的。以中方代表而言，多数人是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很容易认同亚洲各国为独立自由联合一致，抵抗西方列强的思想，而不像全亚细亚协会某些人士那样另有政治企图。即使是饱受舆论界批评的蔡晓白也创办过《大亚杂志》，“鼓吹亚洲各民族之和平”^①，其所在亚洲民族协会曾致函日本加藤高明内阁，要求改善对华政策，实现两国的真正亲善。^②因此，他虽有反共思想，但还不能简单地称为“中国之日本走狗”。印度代表也希望会议有助于本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其中婆斯（Bose）为甘地驻日代表，曾于1912年谋刺印度总督哈定，是印度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③另一因从事独立运动被英印当局驱逐的贵族不拉达蒲（Bratap），则打算以阿富汗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正因如此，会议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密切注意。

1926年7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忧心忡忡地指出，亚细亚民族会议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其主要目的是刺激弱小不满民族的代表们的革命思想，反对白人权威。这不利于日本将来与英、美合作实现太平洋和平的利益。^④英国政府则要

^① 《大亚杂志》发行于1922至1925年，以“联络亚洲各民族之感情……鼓吹亚洲各民族之和平”为宗旨，见该刊第29期封二，1924年10月。

^② 《在上海 The Asiatic Association 对日決議事項》(1924年6月)，《文化施設及狀況調査關係雜件/施設設計圖關係民族問題》第二卷，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錄，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ゾン復制，I-0873，第226頁。

^③ 黄政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17页；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03页。

^④ “Against The Pan-asia Boys”，*The New York Times*，July 17, 1926

求日本政府阻止不拉达蒲参加会议。其时，日本由若槻礼次郎的宪政会内阁执政，奉行与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为防止与英美关系的恶化，日本当局宣称与会议无关，内务省以不拉达蒲遗失了护照为由，禁止其登陆。宪政会议员降旗元太郎、田中善立考虑到会议可能提及“二十一条”问题和朝鲜、台湾独立问题而带来的立场困难，取消了出席会议的原定计划。^① 长崎市长锦织干藉口先前接待中国实业代表团耗费较多，拒绝提供会议资金。就连会场也遭到长崎商业会议所的谢绝，改在条件较差的基督教青年会馆。^②

综上所述，中方代表和反对者对会议的理解与事实真相均有一定距离。一方面，会议的发起者为岩崎勤、今里准太郎等政友会众议员，而并非反对者所言的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等党魁，后者不过列名全亚细亚协会的顾问而已；且会议没有得到宪政会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不能将今里准太郎等人不加区别地视为日本政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另一方面，会议也不像中方代表所说“无政治意味”，日本代表对中日亲善有所觉悟，毕竟今里准太郎等人开会的主旨是以日本为中心联络亚洲各国来抵抗英美的威胁。他们只是高唱“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而缺乏实质性的措施去促进亚洲各民族的平等自由，因此中国的反对者们有理由认为会议不过是日本以亲善的空名欺骗亚洲各民族、推行侵略政

^① 《全亞細亞會議ニ對スル外務省ノ態度ニ關シ今里代議士談話ノ件ニ就テ》，《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I-0868，第125—126页；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63页；《大會は問題にせぬ》、《アジア民族會議の代表上陸を禁止さる》，《東京朝日新聞》1926年7月30日。

^② 長崎縣知事富永鴻：《亞細亞民族會議會場決定其他ニ關スル件》（1926年7月19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I-0867，第232—233页；《日帝国主义者弄巧反拙之侵略计划——全亚洲民族会议之失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策的工具,有理由否定中方代表出席该会。此后随着会议的举行,日本代表的动机公诸于众,又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更大一轮的反对运动。

二

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正式会期为8月1日至3日,预备会则定于7月15日举行。中方代表自始谋求国家的独立平等,日本代表则考虑如何确立本国的亚洲盟主地位,双方的目的迥然不同,冲突不断。

7月15日,先期抵达长崎的北京代表黄攻素、林可彝、王世鼐三人与日方代表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全亚细亚协会嘱托),印度代表婆斯等人商讨议事日程。当林可彝表示中国方面拟提出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时,今里氏惊诧地问道:“此中国政府请君等提出耶?”黄攻素指出,这是大家的公共主张,“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日方又表示该案不能在亚洲会议上提出,应由中日会议解决。中方坚持“非提出通过不可”,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不决。最后,黄攻素以当时英国在新加坡修筑军港为例,指出:日本如果不取消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改善中日感情,扩大在华商业,就难以与英国竞争,抵制英国的威胁。今里氏才表示考虑该提案。另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日方准备邀请白俄帝制派谢米诺夫以蒙古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中方坚决反对曾扰乱蒙古的谢米诺夫的代表资格,并认为即使有蒙古代表与会,亦须随中国代表出席。尽管谢米诺夫曾在长崎报上透露,将在亚会发表政见,但在中方代表的反对下,没有参加会议。^①这两件事说明日方所谓“中日提携”不是以

^① 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12—15,18页。

两国平等合作为基础，并未认真考虑中国人民要求主权独立的愿望，中方代表对会议寄予厚望是不现实的。

8月1日下午2时，各国代表先举行秘密会，以协调中日双方的意见，保证正式会议的顺利进行。当今里氏宣示中方代表将提交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后，日本代表政友本党系议员则元由庸、森肇、永峰与一3人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一事应在亚细亚联盟成立后从长讨论。中方代表则坚持会议应首先通过该提案，以表示中日合作的一种诚意。日代表大谷猛（曾任段祺瑞的顾问）、佐伯好郎（明治大学教授）支持则元由庸等人的意见，而田中守平同情中国代表的要求，希望日方予以谅解。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中方代表见对方无可通融，便一致退出会场。婆斯、田中守平等4人极力调解，劝令则元由庸、森肇、永峰与一、佐伯好郎4人退席，并决定认可中方的提案，才避免了会议的中途夭折。^① 该案原文如下：

全亚细亚民族会议之召集，为谋求全亚细亚民族平等之实现，以达全亚细亚民族共存共荣之目的。然中日间之不平等条约不先取消，是亚洲民族自身间已失其平等，复何辞向白色人种要求平等与解放，故现在亚细亚民族间不平等条约自应取消，尤以日本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件，为亚细亚民族共存共荣目的起见，应互相表示诚意，努力于撤消运动。^②

从中可看出，中方要求日本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理由主要

^① 林耕馳：《亚洲民族大会之经过》，第10—11页；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34—35页；長崎縣知事富永鴻：《亞細亞民族會議第一日ノ状況ニ關スル件》（1926年8月2日），《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1-0867，第391页。

^② 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48页。

是：只有亚洲民族间平等了，才能向欧美国家求平等与解放，实现亚洲各民族的共存共荣；而没有列举和斥责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及其弊端，语气相当委婉。但即便如此，仍遭到了多数日本代表的反对，其所谓“中日亲善”的虚伪性可见一斑。

下午约5时30分，亚细亚民族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代表34人。其中，中国代表12人（除前文所述10人外，长崎中国学生会的沈德和越南人郑天锡系临时加入），日本12人（不包括则元由庸等4名退席者），印度7人，朝鲜2人，菲律宾1人。^① 会议除通过秘密会就已确定的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外，重点审议《全亚细亚联盟暂定规约》。该约由日方起草，黄攻素、婆斯等人略加修改而成，规定：全亚细亚联盟“以平等正义为基础，而图实现世界恒久和平，并将一切阶级的、人种的以及宗教的差别撤废，以确保全人类之自由平等”为宗旨。工作范围包括：1. 关于亚细亚精神的及物质的文化之复兴事宜；2. 关于亚细亚诸国间现存不平等条约之撤废事宜；3. 关于文化的、经济的以至各方面亚细亚民族之提携事宜；4. 关于亚细亚出产各货之使用，并亚细亚各国产业之发达奖励事宜。^② 可以说，该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抽象的美好的亚洲联盟蓝图，代表们自然是一致通过。

8月2日，会议专门审议提案。其中多数提案涉及全亚细亚联盟的实现步骤和措施，是规约的具体化，如设置全亚细亚通信机关、建设亚细亚会馆、创办亚细亚大学、研究亚细亚公用语等。代表们对这些提案没有大的意见分歧，相继予以通过。但是，当日本代表提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创办亚

^① 《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頸末》，第25頁，載《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1 0868，第273頁。

^② 黃攻素：《亞細亞民族第一次大會始末記》，第49頁。

细亚兴业机关等案，有可能违背联盟“以平等正义为基础”的宗旨时，中方代表奋起反对。中方认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将损害中国的铁道权、金融权，提出：“须俟有详细调查与办法，向国人公开而得谅解时，始可议之。”而创办亚洲兴业机关，必须先撤销“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是案即不能通过。”日方辩称：“条约系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争论激烈，气氛紧张。后经婆斯、菲律宾代表威尔沙调解，将 3 提案予以保留。^①

此后，中方代表提出日本应取消对华商、华工一切苛例案和支持印度独立案，但遭到日方代表的反对。日方以“地狭民众，限制华工有不得已苦处”为由，将前案交委员会审查；而以“如果讨论印度独立问题，大会将被解散”为由，建议各代表在会后自行交换意见。^② 本来朝鲜代表姜世馨（新朝鲜社社长）准备出席会议提交高丽独立案，也为今里准太郎所阻止，其理由是：如果姜发表激烈演说，大会将被警察干涉解散。^③ 本日会议的结果表明，日方倡立全亚细亚联盟的目的并非像《规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好，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亚洲各国修建铁路，创办银行，扩展日本的贸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以与欧美列强争胜。至于印度、朝鲜等国的独立平等，是不值一顾的。尽管日本当局派出多名警察和便衣监

-
- ① 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 40—41 页；《全亚细亚民族会议》，《晨报》1926 年 8 月 9 日；长崎县知事富永鸿：《亚细亚民族会议第二日状况》（1926 年 8 月 3 日），《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亚细亚民族問題》第一卷，1-0867，第 423—424 页。
- ② 长崎县知事富永鸿：《亚细亚民族会议第二日状况》（1926 年 8 月 3 日），《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亚细亚民族問題》第一卷，1-0867，第 425—426 页。
- ③ 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 42—44 页。

视会场，报界也传言会议若出现过激言论将被取缔^①，但为什么中国代表可以直言不讳，而日本代表却不敢呢？说到底，是因为朝鲜的独立会危及日本的利益，而支持印度独立会迁怒奉行“协调外交”的当局，倘若会议真的解散了，他们借会议实现亚洲盟主的计划也就戛然而止，所谓“警察干涉”便成了他们应付中、朝代表的最好藉口。

8月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首先，各国代表接受婆斯关于表彰亚细亚运动有功者的提议，推荐了各自国家的人选。印度代表推举的是圣·甘地、尼尔、泰戈尔三人，中方推荐的是已逝世的孙中山，而日方推荐的是犬养毅和头山满。^②这也反映出各国代表对“亚细亚运动”的不同理解。甘地等人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运动，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孙中山曾在1924年11月对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演讲“大亚洲主义”，倡导亚洲各民族和各国家以固有的注重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为基础，平等合作，反抗欧美的殖民主义；并忠告日本不要继续做主张功利强权的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而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③犬养毅、头山满所信奉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明显不同，其核心是：亚洲各国首先是中国、朝鲜等国须在日本的统领下，“戮力攘夷”，排除欧美在亚洲的势力，“布皇道于全世界”。^④可见印度和中国代表所理解的“亚细亚

① 在英特命全權大使男爵松井慶四郎：《全亞細亞大會ニ關スル新聞記事送付ノ件》（1926年9月13日），《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1-0868，第223、227页。

② 《亚细亚民族大会》，《晨报》1926年8月10日。

③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401—409页。

④ 吴剑杰：《从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86页。

运动”是求本国的独立及亚洲各国的平等合作，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日本代表的理解则是由日本领导亚洲各国，称霸世界。

接着，会议推选今里准太郎、大川周明、黄攻素、林耕馀、婆斯、不拉达蒲等8人为全亚细亚联盟的理事，并决定次年在中国举行第二次全亚细亚民族会议。最后，由各国代表发表演说、祝辞。中方代表刘华瑞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特点，称日本立国的要素与中华文明因缘极深，如果遵循中华文明的真谛，就可以扫清中日间的恶感，推进亚细亚各民族的发展。蔡障川则呼吁中日间的问题不解决，亚细亚各民族的团结将难以实现，既然会议通过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就要努力实行。这番话义正词严，却惹恼了列席旁听的日人松坂义雄，竟高呼：“什么叫做不平等条约，实与你等之幸福呢。”^①看来，中方代表的期望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罢了。

当会议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界的反对之声顿时高涨。上海学生联合会宣称，日代表提出的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等3案，目的在于“操纵全亚洲之经济权，垄断全亚洲之市场，占有亚洲之铁路权，而握全亚各弱小民族之命脉”，“倘日帝国主义者所希望亚洲民族大会之野心果尔实现，则全亚洲被压迫人民将皆入其彀中矣”。^②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则批评日本“假民族会议之美名，施行经济侵略之计”，赴会的华人系私自动，“无任何一方代表资格之存在”。^③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斥责日代表“欲以大亚细亚门罗主义闭绝欧美列强利益均沾之说，藉以独霸亚洲之雄图，其计至狡其心至毒”。^④

-
- ① 《全亚细亚民族會議頴末》，第53—65頁，載《民族問題關係雜誌／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1—0868，第287—293頁；林耕馀：《亞洲民族大會之經過》，第22頁。
- ② 《中韓兩團體反對亞細亞民族大會》，《申報》1926年8月3日。
- ③ 《對日外交會反對亞洲民族會議電》，《時事新報》1926年8月4日。
- ④ 《亞洲民族會閉幕後余音》，《時事新報》1926年8月9日。

《广州民国日报》认为，亚细亚民族会议代表了日本推销大亚细亚主义、转移中国民众反帝目标的利益，而对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民运动的利益毫无益处。其具体表现是日代表提出了建筑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通信机关、设立兴业公司和金融机关等案，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路侵略和经济侵略政策。因此，国人应坚决反对该会议，“假如中国民族中有赞成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人也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① 该报代表了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左派的观点，具有较强的反帝色彩，但只是从日方提案的角度来点评会议，而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全面评价了会议的经过及其结果。郑超麟在《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一文中指出，“亚细亚国际联盟”是大亚细亚主义精神所寄托的形式，如果组织成功，将“加紧中国劳动民众的剥削，促进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日本代表之所以通过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是因为中方代表不是“有力量能左右该国大政方针的人物”，通过无妨；而且，中国赴会者代表著名的亲日卖国机关如亚细亚民族大同盟、亚细亚民族协会等，并无诚心要废除“二十一条”，之所以提出该案，是“因为中国民众反对这次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的呼声太高了”，想遮掩他们的罪恶。^② 署名“吉了”的文章《亚细亚国际联盟》则强调，在日本实行侵略朝鲜、台湾及中国的政策的情形之下，一切甜蜜名词如“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谁也骗不了，“真正的‘共存共荣’、‘亲善’等应该是日本工人、暴动的日本农民及其他亚细亚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并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事，而不是这次会议之发起者、召集者日本统治阶级的事”；日本所

① 启修：《所谓亚细亚民族会议露出马脚了》（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9日。

② 超麟：《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向导周报》第166期，1926年8月6日。

愿意组织的亚细亚国际联盟“与欧洲的国际联盟一样，是帝国主义窃掠和残暴的工具”。^①

如果说中共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批评会议，那么《醒狮》周报的评论则带有国家主义的意味。该报认为，日人开会的目的是以东亚盟主的资格“呼号大亚细亚主义，愚弄东亚之弱小人民，以遂其囊括亚洲之野心”，中方代表“强以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絮聒于野心家之前，是又何啻与虎谋皮耶？”虽然会议通过该案，看似有些功绩，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工作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只有“建设全民福利之统一的政府，讲求富国强兵之政策，以与强权抗”，“至国家主义成功之时，不平等条约方有取消之一日也”。^②

北京《晨报》也刊发时论《亚细亚民族会议之纵横观》，批评日本代表口头上主张中日亲善，标榜“公理”、“正义”，“然一到我国代表提出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彼等便瞠目结舌，惊骇若出意外，便反复驳难，责我为不当，心目中觉得在华之既得权利为当然之事，由此观之，宁尚有丝毫之公理正义之可言”；并警告说：“日本若不实行放弃在华既得之权利，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亚洲民族，则全亚永无联合之一日。”^③

作为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现代评论》试图对会议做出客观的评价。它首先将“亚洲门罗主义”和“大亚洲主义”的概念区分开来，称前者是“日本雄踞亚洲抗拒欧美的表示”，后者是“日本要自为领袖团结亚洲内部的表示”；接着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美人的亚洲——这个大亚洲主义本是亚洲人反抗欧美侵略很好的工具；但就现在情势而言，日本人一日不抛弃他们

^① 吉了：《亚细亚国际联盟》，《向导周报》第166期，1926年8月6日。

^② 曾解：《全亚民族会议之结果如何》，《醒狮》周报第96号，1926年8月14日。

^③ 乔昭然：《亚细亚民族会议之纵横观》（时论），《晨报》1926年8月20日。

帝国主义的思想,一日不能邀得亚洲其他民族的谅解,而这个大亚洲式民族运动也就一日不能成功。日本对中国仍然怀抱侵略的主义与政策,对高丽不能让他独立,哪能说到大亚洲主义?日本代表在会所提出的方案,其中经济帝国主义的意味,超过美国的‘大美洲主义’和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的大亚洲主义是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不是亚洲各民族的大亚洲主义。”^①这里,《现代评论》虽然对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解还不全面,但认识到它不同于“亚洲门罗主义”,有反抗欧美侵略的一面,日本的所作所为“不是亚洲各民族的大亚洲主义”等,是有一定见地的。

综上所述,亚细亚民族会议遭到了中国舆论近乎一致的谴责。人们认为,日本代表关于建立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和兴业公司的提案是为了控制“全亚各弱小民族之命脉”,其提倡的全亚细亚联盟是日本帝国主义窃掠和残暴的工具;其对于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的不情愿态度反映了他们所谓“中日亲善”、“平等正义”的虚伪性。总之,会议不过是日本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欺骗亚洲弱小国家,以树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与欧美列强争胜的工具。中国不应该派代表出席会议,赴会者纯属私人资格,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等。这里的“大亚细亚主义”除《现代评论》指出其有反抗欧美侵略的一面外,多数批评者将它看作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代名词。其实,“大亚细亚主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本一国的利益为中心、与西方“协调”对亚洲的扩张侵略政策;另一方面又主张亚洲各国联合、一致抵抗西方的入侵。^②而且有些提倡“大亚细亚主义”的人是主张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如中国的孙中山,日本的田中守平

① 沛:《大亚洲民族会议》,《现代评论》第4卷第88期,1926年8月14日。

②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3月版,第14页。

等。但是,20年代的日本,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成为亚细亚主义者的主流思想,并指导了这次亚细亚民族会议。会议的经过及其结果很容易让人们对“大亚细亚主义”一概嗤之以鼻,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方代表对于会议的结果及舆论的批评反应不一。王世鼐在《晨报》公开自己参与会议的经过,称当初赴日开会“乃感于国民外交之必要”,后发现日代表无诚意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所谓“人道”、“正义”不过是冠冕堂皇之辞。因此,他与持有同感的林可彝、石磊没有参加第三天的会议。^① 黄攻素则颇感委屈地说:“吾侪未得政府国库分文补助,纯以吾国国民之资格,与日本民间团体,签字结约,以无条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两国间真民意之表示。将来不难根据此种民意,为正式交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一大臂助。而乃加以反对……事之难以索解者有甚于此者乎。”^② 林耕馀也表示,此次会议通过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未始非我前途之福音,虽曰一纸空文,无裨事实,然而造成全亚细亚一部分国际有力舆论,并唤醒日本多数胸怀狭隘之迷梦,此后好自为之,未必不达完满之希望”。^③ 的确,中方代表不惜退席以通过该案,并努力抵制日方有损中国主权的提案,表现出一定的爱国责任感,应该予以肯定。但黄攻素、林耕馀等人没有看清楚日方开会的真实目的,竟认为该案是“两国间真民意之表示”,可为将来正式取消不平等条约提供“臂助”,或“唤醒日本多数胸怀狭隘之迷梦”,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从日本各界对该案的反应来看,不仅大邱市的

^① 王世鼐:《亚洲民族会议之回忆》,《晨报》1926年8月13、14日。

^② 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62页。

^③ 林耕馀:《亚洲民族大会之经过》,第34—35页。

14个右翼团体通电表示反对^①，而且各报对该案的报道多含混其词，“对此议案全文登载者甚鲜”^②；甚至批评日方主办者对于中方的提案没有充分准备，通过该案是“不负责任”。^③由此可见，日本民间并没有形成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的有力舆论，更遑论其政府会改善对华政策了。不过，黄攻素等人坚信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以东道主的身份召开了第二次亚细亚民族会议。

三、

第二次亚细亚民族会议原定于1927年秋在北京举行，后因中国政局激变，黄攻素等人认为，会议应该取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谅解和援助，加之上海交通方便，便改在11月于上海举行。^④与第一次会议相似，中日两国代表之间有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一度使会议陷入决裂的境地。

本次会议分为碰头会、预备会和正式会议，先后出席的代表有中国黄攻素、蔡晓白、石瑛（兵工厂主席委员）、吴山（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总干事），日本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中谷武世（行地社干部）、北条太洋（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理事），印度婆斯、夏士屈里（亚洲民族协会委员），阿富汗不拉达蒲，菲律宾威佐曹博士等50

① 《大會反対の決議》，《大阪朝日新聞》1926年8月3日。

② 黄攻素：《亚细亚民族第一次大会始末记》，第60—61页。

③ 水野直樹：《1920年代日本·朝鲜·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アジア民族會議をめぐる三国の論調》，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第522页。

④ 長崎縣知事佐上信一：《全亞細亞民族會議ニ関スル件》（1927年8月3日），《民族問題関係雑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三卷，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ゾー復制，I-0869，第21页。

余人。^①本来驻沪的高丽临时政府准备派代表与会，但日本代表担心会议涉及朝鲜独立问题，称“若许韩人加入，即当退出会议”，从而将朝鲜代表拒之门外。^② 11月1、2日，因不拉达蒲未到上海，中、日、印等国代表先举行碰头会，商讨提案问题。中方代表要求日方取消设立中央银行、敷设中央铁路的提案，而接受本方的4项议案：日本须放弃对满蒙之积极政策；须撤废中日间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于六个月内订结对等条约；要求撤退在中国各地之外国军舰军队；日本须撤废对于韩国之种种压迫。印度代表则明确表示支持中方的第2、3项议案，并提议“同情俄国的无产运动”。日本多数代表对此颇为气恼，认为中、印代表无视会议的性质，乱提议案，日方没有必要再出席会议，不如归国期待其反省。^③ 4日，经抵沪的不拉达蒲的调解，各国代表举行预备会，继续就提案问题交换意见。中方代表提出修改后的5项议案：援助中国关税自主及收回一切治外法权；实行去年所通过之取消中日间及全亚细亚一切不平等条约；停止侵略满蒙；努力解放亚细亚各弱小民族之种种压迫；反抗英国侵略中国领土等。这里中方取消了原提案中要求日本6个月内订结新约和停止压迫韩国的条款，态度有所缓和，而“停止侵略满蒙”案是针对当时日本欲修建“满蒙五路”而起，应该说不无道理，但遭到日方代表的极力反对。双方争辩达1小时之

① 代表的身份参见《亚洲民族大同盟将在上海开会》，《申报》1927年10月31日；《民族会准备今日开会》，《民国日报》1927年11月3日；《本会欢宴演词》，《大亚杂志》第38期，1925年12月；《今雨細雨會設立之宗旨》，《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1-0867，第182页。

② 《民族会议二次延期》，《时事新报》1927年11月4日。

③ 《亞細亞民族會議は日本苛め》（1927年11月3日），《文化施設狀況調査關係雜件／在外ノ部》第七卷，日本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ゾー復制，H-0864，第221页。

久，仍无结果，于是中方代表气愤地声明：“非得日本代表明白答复愿通过停止侵略满蒙之议案以后，不再开会。”^①后经不拉达蒲调停，双方才表示重新考虑该案。

7日，正式会议召开。由于当天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上海当局禁止政治集会，因此会议冠以亲睦会的名义，仅用半天就议决了所有提案。其中，中方代表所提“停止侵略满蒙”一案修改为“因日本之对华政策有伤中国之感情，日本对满蒙政策务须加以改革，日本以承认之”，与其他4项议案一并通过。日本代表不再提及设立中央银行、敷设中央铁路等案，而是提出撤废人种之不平等待遇、撤回新加坡及珍珠湾之防备等新议案，后又将“及珍珠湾”4字削除，予以通过。会议还批准了不拉达蒲提出的10条“全亚民族之共通提案”，包括：亚细亚各民族绝对自由，不能有任何压迫；推派代表分赴欧美各国宣传宗教；亚细亚各民族须彻底合作反对侵略之国家；亚细亚各重要都会应设商业机关；普及世界语言、提高科学知识、遍及军事学识等。其中，第9条议案为“解放中国问题”，下分3项建议：联合中国各实力派取缔杂色军队；中央政府应派若干人研究外交问题，组织完美之行政机关；促进中国取消治外法权、撤废租界、关税自主。第10条议案为“欲救济中国必须诚意地与日本合作，同情于美俄两国”。最后，会议推选黄攻素、石瑛、周贯虹（工会统一会主席委员）、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中谷武世、婆斯、不拉达蒲等8人为全亚细亚联盟的最高执行委员，宣告闭会。^②

^① 《亚细亚同盟昨开预备会》，《石瑛复冷欣书》，《申报》1927年11月5、14日；《アジア民族會議の開會は絶望ミなる》，《大阪朝日新聞》1927年11月6日。

^② 《民族会议正式议毕各案》，1927年11月9日《申报》；《亞細亞民族會議終了》（1927年11月7日），《文化施設及狀況調查關係雜件/在外ノ部》第七卷，H-0864，第221页。

会后，南京国民政府邀请代表们赴宁访问，除了礼节性的款待之外，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期望的支持和援助。^① 鉴于中方代表吴山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军政府司法部次长，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黄攻素、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中谷武世、不拉达蒲等人希望他能牵线搭桥，与他举行了特别委员会议。但吴只是表示谅解日本方面对于亚细亚联盟的热心和苦衷，并决定将不拉达蒲的 10 条提案以特别委员会共同议决案的名义发表，其余中日间的困难问题则留待其他会议解决。^② 此后未见下文。看来，南京政府并未将亚细亚民族会议放在眼里，而黄攻素、今里等人关于亚细亚联盟的构想注定是一纸空文而已。

更令代表们失望的是，中国各界对本次会议依然是冷眼相看，大加鞭挞。早在 10 月 22 日，上海大陆学会就致函各团体，称该会关系“国命存亡”，“伏乞一致声讨”。^③ 不过，由于当时南京政府限制民众运动，人们没有立即给予热烈的回应。相反，11 月 1 日的《民国日报》指出，当今的国际情势是白种民族联合向亚洲进攻，亚洲各民族为对付侵略，须联合一致，相与扶助，因此组织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匪特无可反对，要为当务之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争论大同盟的存废，而是督促它做实际的努力，中国代表的任务“不在与会外人争一日之短长，乃在于会内联合各弱小民族，共伸正义，以打倒蚕食亚细亚之各种帝国主义”；日本若能“放弃其帝国主义，同为参预之一员，固所深愿，不然，即令日本退会以去，其于大同盟固依然丝毫无妨也”。^④ 实际上肯定了亚细亚民族会议和亚细亚

^① 《民族会议代表之行动》，《时事新报》1927 年 11 月 11 日；燕召亭：《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现代评论》第 6 卷第 156 期，1927 年 12 月 3 日。

^② 《请看民族会议》，《时事新报》1927 年 11 月 15 日。

^③ 《亚细亚民族会议之反响》，《申报》1927 年 10 月 23 日。

^④ 慎予：《论亚细亚大同盟》，《民国日报》1927 年 11 月 1 日。

联盟的必要性。

此后随着会议的进行，日本代表否认“停止侵略满蒙”案的消息公诸报端，人们压抑的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上海海宁路、虹口六路、十一路等数十商界联合会和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等团体先后发表宣言，批评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国人抵制该会。^①《民国日报》对会议的态度也由支持转向反对。4日，该报副刊《觉悟》指出，日本既然提倡“全亚细亚各民族联合起来”，为什么田中内阁始终不愿放弃其侵略满蒙的思想，且出兵山东不惜破坏中日民族间的感情，资助军阀以破坏国民革命。因此日本开会的目的不过是诱骗、麻醉亚洲各民族，以实现其全亚细亚大盟主的目标。国人应该与印度、朝鲜、安南等被压迫民族团结互助，改造此种御用的亚细亚民族会议，谋求全亚细亚、全世界、全人类的解放途径。^②9日，该报又刊发社论，批评会议将中方“停止侵略满蒙”案修改为“日本对满蒙政策务须加以改革，日本亦承认之”，代表了日本的利益，黄攻素之流竟同意通过，简直不是中国人，而只是“日帝国主义怂恿出来的崭新曹章陆”，“所谓全亚民族会议者，不啻一日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也”。^③作为上海市国民党党部的喉舌，《民国日报》从肯定亚细亚联盟为当务之急、鼓励中方代表于会内“共伸正义”，到斥责黄攻素不是中国人、否定会议为日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表明亚细亚民族会议在国人心目中是何等的失败。

《醒狮》周报对会议做了3点批评：一是日方因满蒙问题之争执竟欲全体退席，且拒绝朝鲜代表与会，毫无理由，“其轻视中国国

① 《各商联会反对亚洲民族会议》，《申报》1926年11月6日；《市民大会反对民族会议》，《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3日。

② 张源鹏：《反对亚细亚民族大会》，《民国日报》1927年11月4日副刊《觉悟》。

③ 德徵：《呜呼黄攻素的全亚民族会议》（社论），《民国日报》1927年11月9日。

权，侮辱弱小民族不亦已甚”，该会既为野心家所把持，已无复存在之目的。二是与会各国代表既不是各民族政府所选派，也不是各民族真正之民众团体所推举，“所代表者虽名为各民族之意旨，实即各个人之企图，佯为各民族之利益，实则为个人进身之阶”，代表资格既如此含混，该会能否存在亦成问题。三是长崎之会虽通过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案，但日本侵略满蒙，出兵胶鲁，资助军阀兵饷枪械的事实说明，“去年一纸空文，直粪土瓦砾之不若”，该会之价值直可谓等于零。该报呼吁国人应努力“求全民革命之完成，待国家主义成功，国基奠定，国权恢复”，借此宣传国家主义派的主张。^①

《现代评论》如去年那样，从“大亚洲主义”的角度评价该会议，称：孙中山总理曾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警告日本应该“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现在亚洲各民族大联合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它虽然提倡大亚洲民族主义，但侵略中国，压迫高丽，却是实行小日本民族主义；亚细亚联盟在小日本民族主义的操纵之下，而希望实现大亚洲主义，达到亚洲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背道而驰。此外，该刊还严厉抨击了会议所通过的“欲救济中国必须诚意地与日本合作，同情于美俄两国”一案，指出：亚洲各民族之间彼此利害冲突的，只有主动的日本及被动的中国，所以日本要求各民族都承认“亚洲内部的问题最紧要的就是中国，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诚意地与日本合作’”。近几年日本着力经营满蒙，遇着的对手是俄国，为避免冲突，故多方要与俄国妥协。再者，日本要大规模地经营满蒙，缺乏足够的资本，所以最近同美国妥协，申请 6000 万美元的贷款，日本代表也临时撤回反对美国在珍珠湾建筑海军基地的提案。印度和阿富汗这几年借重俄国反

^① 树人：《谈第二次亚洲民族会议》，《醒师》周报第 162 期，1927 年 11 月 19 日。

抗英国，自然是要赞成联俄。因此，会议郑重其事地主张“救济中国”，必须“同情于美俄两国”，这等于是说“日本经营满蒙，必须要美俄两国的帮助”。^①由此可见，《现代评论》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比较清楚，基本上道出了日本代表为什么会接受该议案的原因。日本代表之所以不再强调反美，与当时日政府向美国借贷开发满蒙的资金有一定关系。该案同时满足了日方要求中国诚意合作，以及中、印代表反对英国压迫的愿望，因而作为共同议决案之一予以发表。

总而言之，本次会议又遭到中国舆论近乎一致的否定。尽管黄攻素等中方代表提出“援助中国关税自主及收回一切治外法权”等案，且迫使日本代表取消设立中央银行、建设中央铁路的议案并承诺改革满蒙政策，但人们对此并不满意，斥责他们为“新的曹陆章”，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意旨。人们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应该出席该会，它不过是日本诱骗、麻醉亚洲各民族，以实现其全亚细亚洲大盟主的工具。这种认识基于如下事实：日本代表拒绝朝鲜代表与会，抵制中方关于满蒙的提案；虽然长崎之会通过了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案，但日政府反加紧侵略满蒙，出兵胶鲁，资助中国军阀内争。在胜于雄辩的事实面前，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代表高唱“全亚细亚各民族联合起来”而鼓掌欢呼，相反只会冷眼相看、痛骂一番了。

需要指出的是，与上次会议相比，中国公众对本次会议的关注程度稍显逊色。不仅中共对此保持沉默，就连去年对会议跟踪报道的《晨报》也惜墨如金，仅刊登了一则消息。^②其中原因，除了南京政府打压中共、限制过激言论外，还可能在于众多国人以为第一

① 燕召亭：《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现代评论》第6卷第156期，1927年12月3日。

② 《亚细亚民族会议》，《晨报》1927年11月4日。

次会议已暴露了日本代表的“野心”，第二次会议莫过于此，不足挂齿。但即便如此，对于本次会议的反对呼声已足够宏亮，足以震醒某些迷信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能拯救中国、振兴亚洲的人。中方代表石瑛就表示认可《民国日报》的批评，其本人将不担任联盟理事和最高执行委员。^①今里准太郎、不拉达蒲等人本打算在1928、1929年11月于阿富汗喀布尔、中国大连再举行两届亚细亚民族会议^②，但随着第3次会议的日期临近，报界不见有中国代表的消息，反倒是不拉达蒲抱怨：“在亚细亚同洲中，有一部受欧洲物质文明之压迫，而转以压迫同洲未联合之民族。”^③明确表示对日本的不满。究竟这两次会议开成与否，其结果如何，中国报界并无消息，这也许不能作为该会没有举行的证据，但至少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不再相信标榜所谓“亚洲民族大团结”的亚细亚民族会议了。

四

综观两次亚细亚民族会议的过程及中国各界的反应，似可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并得到了上海亚洲民族协会、亚细亚和平研究会、亚洲文化共进会、亚细亚问题讨论会的响应，这说明在中国民间的确有一部分人具有联合亚洲各民族包括日本，抵抗英美国家压迫的思想。他们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并不反感，相反希望它

^① 《石瑛复冷欣书》，《申报》1927年11月14日。

^② 《泛亚细亚会议》、《泛亚细亚会议明年在大连举行》，《京报》1928年9月22、25日。

^③ 《印度名士大天明主对于全亚细亚联盟之意见》，《北平日报》1928年9月2日。

有助于中国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虽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且遭到多数国人的反对，但不容忽视他们的存在，忽略对他们思想及其行为的研究。因为，正是他们促成了轰动一时的亚细亚民族会议的召开。

第二，亚细亚民族会议之所以吸引了一些中、印人士的参加，也在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它虽然蕴涵了日本称霸亚洲的扩张意识，但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不明其中奥秘者，自然举手赞成了。不过，毕竟中、日等国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冲突频起也就在所难免。如果只从会议的结果来看，既通过了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等案，又建立了“以平等正义为基础”的全亚细亚联盟，而不看日本代表抛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等案，并极力抵制中方提案的过程，就很容易一概认为与会者是追求“由亚洲人统治的非殖民地亚洲”的先驱。^①美国学者顾德曼将这一光环放在中、印代表身上或许成立，但要套在日本代表的脖子上，则会黯然失色。

第三，就中国各界对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批评而言，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如斥责中方代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看到他们维护国权的一面；又如将今里准太郎等日方代表视为日政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言人，没有看到他们和日政府的区别等。但总体上来说，人们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名为谋求“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实则扩张日本的亚洲利益的虚假面具，打破了某些人对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幻想，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日本对于中国的反对运动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相关的舆论报道寥

① Grant K. Goodman:《1926年長崎全アジア會議》,FUKUOKA UNESCO(福岡ユネスコ協会)第8号,1973年,第70页;

若晨星，即使谈到了，也视之为“妄言”，而没有反省它产生的原因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其后果在水野直树先生看来，“导致了30年代日本借‘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的名义发动了侵略亚洲的战争”。^①时至今日，日本一些朝野人士试图抛开历史问题，提倡以本国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这不禁让中国人民怀疑它是“大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复活，因而反应冷淡、支持若无。日本只有正视和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和亚洲各国携手共进，才能促进“东亚一体化”，实现东亚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作者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

① 水野直樹：《1920年代日本・朝鮮・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アジア民族会議(議)をめぐる三国の論調》，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第543—544頁。